

## 17~18世纪阮氏政权对外贸易与农村经济的 联动发展

晏梓 何平

**摘要：**从阮氏政权<sup>①</sup>对外贸易与农村发展联动机制的视角，梳理17~18世纪阮氏政权经济发展过程，揭示阮氏政权创造“百年繁荣”奇迹的内在机理，是一件有学术意义的事情。16世纪下半叶，阮氏政权从越南中部崛起，与北方郑氏控制的后黎朝形成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南北对峙和分裂割据局面，并向南开拓了今日越南近五分之三国土面积的统治疆域，对越南及中南半岛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与越南历代封建政权“重农抑商”的传统不同，阮氏政权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国家主导发展对外贸易，与世界贸易大国建立起贸易关系和商业网络，农村发展要素被纳入国际产业分工，促进了农村经济生产专业化、商品流通过货币化和流通货币资本化的演化进程。与此同时，阮氏政权利用地缘相近、文化相通的优势，吸引大量华人移民，引进国际资本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实施南部大开发战略，阮氏政权逐渐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形成对外贸易与农村经济联动发展的格局。随着经济、社会、文化融合的加深，华人与当地原住民的融合进程也在加快，为今日湄公河三角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阮氏政权；对外贸易；农村经济；联动机制；联动发展

**收稿日期：**2021-06-15

**作者简介：**晏梓（1994~），云南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史；何平（1956~），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历史与民族问题。

---

<sup>①</sup> 本文的研究对象阮氏政权主要是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下半叶阮氏封建家族在越南南北分裂时期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历史时期上又称阮主时期。法国人称阮氏政权统治的地区为“交趾支那”（Chochinchina），荷兰人称“归南”（Quinam），南方的越南人给这两个地区起了新名称，他们称自己的地区为Dang Trong（内区），而称北方为Dang（外区）。《大南实录前编》在1672年阮郑纷争结束之后，将黎郑政权统治的区域称为北河，将阮氏政权所辖之地称为南河。在本文的论述和引用文献中会交替使用这几个名称。

关于阮氏政权崛起并实现越南历史上“百年繁荣”的奇迹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从社会经济各层面都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但大多数成果仍然停留在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关系分析的层面上，对阮氏政权崛起的内在动力机制缺乏深入分析。很多研究成果关注对外贸易对阮氏政权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贡献，但对阮氏政权发展进程中外部与内部力量的博弈机制关注度不够。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本文认为对外贸易和农村经济是决定阮氏政权发展最重要的两个经济变量，二者的联动发展能充分反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之间博弈的内在传导反馈机制。对外贸易与农村经济的联动发展，推动了阮氏政权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为本文揭示阮氏政权崛起和维持长期繁荣的动因找到了新的研究视角，由此形成本文研究的命题。

## 一、阮氏政权对外贸易兴起的原因和过程

16世纪中叶，全球正处在世界市场的形成阶段，东南亚也迎来了贸易繁荣的时代。阮氏政权抓住机遇，采取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与世界主要贸易力量建立起贸易关系和商业网络，对外贸易迅速崛起，开启了一个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 （一）阮氏政权发展对外贸易的背景

世界市场形成之前，东南亚地区已衍生出很发达的商业文明，其丰富的物产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日后成为世界贸易枢纽奠定了基础。15~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西欧殖民国家的商业扩张，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东南亚作为贸易历史悠久的地区之一，也在此时融入全球市场。16~17世纪，东南亚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和欧洲人一道，在东南亚交易生丝、丝织品、瓷器、棉花、棉织品、白银、铜、香料、糖料、珠宝等商品，形成了以庸宪、马尼拉、阿瑜陀耶、勃固、马六甲、巴达维亚等为代表的著名商业城市，它们成为“风下之地”经济生活、政治权力和文化创新的中心。<sup>①</sup>以这些商业中心为支点连接起来的海上贸易航线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贸易网络的各条航线上，每日均有来自东南亚、中国、欧洲、日本的商船。“在这一时期，东南亚的商人、君王、城市和国家，无论在源于本地还是流经该地区的贸易中都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sup>②</sup>贸易推动了东南亚的商业化和资本化。大量劳动力被卷入全球贸易产业

<sup>①</sup> 安东尼·瑞德著，孙来臣等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页。

<sup>②</sup> 同上。

链，从事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本地人也越来越依赖进口的日用品，如布匹、瓷器、器皿、货币、金属制品等。发端于广顺地区的阮氏政权紧紧抓住时代机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由此开启了“百年繁荣”的历史进程。

阮氏政权对发展对外贸易有着强烈的内在动机。阮潢抚边经营时，面临四大危机：一是北方郑氏政权的威胁。阮潢统治的广顺地区，人口、疆域、军队均不足北方的五分之一，明显处于劣势。按李塔娜估算，1555年，顺化地区人口为37.84万人。<sup>①</sup>广南人口数量不详，由于长期的战乱导致人口流失，其人口数量不会高于顺化地区。郑主可调动的军队有10万余人，而阮主可调动的军队仅2万人左右。阮潢认识到一旦与郑氏公开决裂，将随时面临郑氏集团的威胁。二是统治区不稳定。阮主的辖地为占城国故地，属后黎朝南部边境区，常有匪寇和海盗滋扰，劫掠客商。与此同时，北方战乱和饥荒导致大量流民逃入广顺地区，“人心尚怀反侧，浮海徙莫者多，恐或有贼入寇者”。<sup>②</sup>三是军事防御能力不足。1571年，莫氏军队从海路进攻顺化被阮氏击退，这更凸显军事防御的必要性，而生产大炮、炸药的重要原料如铜、硫磺、硝石、铅均需要进口。四是财源匮乏。在阮氏政权建立之前，广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红河三角洲，疆域狭小，人口稀少，还要向中央政府纳贡，财政收入严重不足。阮主由此认识到发展对外贸易对稳固统治的重要性。“海外贸易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是富裕或者贫穷的问题，而对于幼年的交趾支那，它关系到生死存亡”。<sup>③</sup>阮氏政权一改历代越南封建政权“重农抑商”的传统，大力鼓励发展对外贸易，目的是依靠贸易“迅速建设起这个人力缺少的国家，以抵抗一个在任何方面都比交趾支那大两到三倍的外区”<sup>④</sup>。

## （二）阮氏政权对外贸易关系的建立

从时间上看，阮氏政权较早建立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1558年，阮潢镇守顺化时，正值中国严厉的海禁期，华商与阮氏政权只有零星的走私贸易。1567年中国废除海禁，准许私商出海贸易，阮氏政权通过采取税收优惠，聘请华商参与对外贸易管理，允许华商在会安建立商馆和居住区等优渥政策，吸引了很多华商来到会安参与对外贸易，华商逐渐成为阮氏政权倚重的主要贸易力量。

日商也是阮氏政权对外贸易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中国虽然开放了海禁，但由

<sup>①</sup> 李塔娜著，李亚舒等译：《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sup>②</sup> 张登桂等：《大南寔录前编》（卷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语言研究所整理，有邻堂1961年版，第6a页。

<sup>③</sup> 李塔娜著，李亚舒等译：《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62页。

<sup>④</sup> 同上，第62~63页。

于壬辰战争的爆发，中日交恶，中国一些战略物资如铜、铁、硝磺仍在严禁出口日本之列，为此，16世纪晚期日本幕府发行了数量庞大的“御朱印状”给关西地区的富商和封建领主，鼓励他们远航至东南亚与华商贸易。阮氏政权为了能够对抗强大的郑氏集团，也急需日本的武器和铸币，两国遂于1601年正式建立贸易关系，会安成为中日贸易最重要的贸易枢纽，以此为中心建立起中、日、越三角贸易网络。在朱印船贸易的繁盛时期，日本全国近四分之一的朱印船被派往广顺地区，交趾支那成为日本朱印船到达最多的地区。

葡商是最早与阮氏政权开展贸易的西方商人。1557年，葡商在中国澳门获得居留权后，构建起覆盖东南亚的贸易网络，并利用会安发展与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转口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功。葡商能提供阮氏最急需的先进武器及其制造技术，同时，葡商又向欧洲出口香料和丝绸，获利巨大。

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阮氏政权早期的贸易伙伴之一。1617年阮福源致函荷兰东印度公司派船来商洽贸易，但荷方未予以关注，加之葡商又从中作梗，双方一直未建立正式贸易关系。163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船到会安设立商馆，标志着双方贸易关系正式确立。荷商主要经营从日本长崎到越南会安的铅和铸币进口贸易，也通过会安从东南亚进口胡椒、丝绸贩卖给华商，再由华商转贩到中国。阮氏政权与荷商的贸易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主要原因是阮主对荷兰人支持北方黎郑政权不满，因而经常产生摩擦，双方贸易关系每况愈下。同时，荷商在广顺地区面临来自华商、日商和葡商的激烈竞争，获利越来越低，所以他们于1654年关闭了商馆，与阮氏政权直接对外贸易关系中断。

这个时期东南亚各国的商人在阮氏政权对外贸易过程中也发挥了诸多作用，但他们的贸易能力有限，无法成为阮氏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

### （三）阮氏政权对外贸易的崛起

阮氏政权通过与中国、日本、葡萄牙和荷兰等国发展对外贸易，建立起与东南亚、南亚、欧洲等国的贸易网络，对外贸易逐渐兴盛起来。

阮潢入驻顺化时，中国和葡萄牙商船已在顺化、广南、新州（Tan-chau）和提夷等地开展贸易活动了。随着阮氏政权在广顺地区的统治地位逐渐稳固，会安也凭借区位优势脱颖而出，成为阮氏早期开展对外贸易最倚重的商业中心。会安位于东南亚商路之要冲，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纬度较低，各国商船能利用季风航行至此，会安与秋溢江（Song Thu Bon）及其支流相连，秋溢江和鹭颈江把大占海门和岷港连接在一起，拥有河港和海港双重功能，内陆山区和广南腹地的天然物产和农产品可通过内河航运便捷运输到会安。意大利传教士波里谈到会安的时候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在南方，百里之内约有六十多个海港，其中以会

安为最美之良港”。<sup>①</sup>

华商是阮氏政权最重要的贸易力量之一。会安国际贸易中心形成之后，中国的贵金属、瓷器和棉布等商品都源源不断流向广南。据到过交趾支那的荷商巴克回忆：“中国商人之所以每年都去广南，是因为他们发现此地是一个便于联络邻近诸国及地区的商业中心。运往此地的商品有巨港、彭亨和附近其他地区的胡椒，婆罗洲的樟脑，和来自其他地方的苏木、象牙。而中国商人则以南京棉布、粗瓷等与之交易。如有余资，中国商人又买广南胡椒、象牙、豆蔻等，所以商船回中国时大都能满载而归。”<sup>②</sup>《海外纪事》中这样形容17世纪的会安：“大越国会安府者，百粤千川舟楫往来之古驿，五湖八闽货商络绎之通衢。”<sup>③</sup>由于与阮氏政权贸易往来密切，华商在会安享有优惠的贸易待遇。

日商是华商在广顺地区贸易初期的主要竞争者。为了打破葡萄牙对阮氏政权与日本之间贸易的垄断，阮氏政权主动与日本发展朱印船贸易。最先把日本人吸引到交趾支那的商品是丝绸，居住在会安港的日本人会在日本商船到港之前采购好原丝，以保证日本商船可满载而归。这种采购活动显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该时期交趾支那市场的丝价要取决于朱印船的贸易量。<sup>④</sup>朱印船出口到交趾支那的商品主要包括铜、铁、药罐、帷子、木棉、踞风炉、伞、所带道具、涂物类等武器原料和廉价工业品，<sup>⑤</sup>除了这些商品之外，还有阮氏政权最需要的铸币。据岩生成一统计，自1604年起到1634年，日本官方出洋贸易的朱印船数量一共是331艘，开往交趾支那（会安）的就有81艘，将近占总数的四分之一，<sup>⑥</sup>这清楚地表明广南贸易在17世纪上半叶东南亚贸易史上的重要性。<sup>⑦</sup>除了发展直接贸易，阮氏政权还利用会安大力发展华商与日商之间的转口贸易。何乔远曾说：“日本国法所禁，无人敢通，然悉奸阑出物私往交趾诸处，日本转乎贩鬻，实则与中国贸易矣。”<sup>⑧</sup>从中国出发的华商到达广南后只是出售中国商货，而购入的当地商货往往销往日本，或者从日本返航的华商转道广南，采购当地货物后带往中国销

<sup>①</sup> Chritoforo Borri, *Xu Dang Trung nam* 1621, Ho Chi Minh: Nha Xuat Ban Thanh Pho Ho Chi Minh, 1998, pp.90.

<sup>②</sup> Wilhelm Jozef Maria Buch,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en Quinam: de betrekkingen der Nederlanders met Annam in de XVIIe eeuw*. Amsterdam, H.J. Paris, 1929, pp.68. 转引自李塔娜著，李亚舒等译：《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75页。

<sup>③</sup> 大汕撰，余思黎校：《海外纪事》（卷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0~81页。

<sup>④</sup> 岩生成一：《朱印船与日本町》，至文堂1966年版，第11页。

<sup>⑤</sup> 岩生成一：《朱印船贸易史の研究》，弘文堂1958年版，第241页。

<sup>⑥</sup> 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の研究》，南亚细亚研究所1940年版，第2~5页；第20页。

<sup>⑦</sup> 陈荆和著，王潞、程淑娟译：《会安历史》，《海洋史研究》，2016年第九辑，第133页。

<sup>⑧</sup> 何乔远：《镜山全集·开洋海议》（卷24），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88页。

售。<sup>①</sup>阮氏政权从转口贸易中收益颇丰，中、越、日三角贸易的繁荣成为阮氏政权对外贸易崛起的主要推力。波里是这样描述华商和日本商人在会安进行转口贸易的情形的：“中日两国人系每年在交趾支那之一港口开催并延续约四个月之定期市之主要商贾。后者（即日本人）以其船只携来价值四五万两之银货，而前者（即中国人）则以一种称为舢之船舶装载大批良质生丝及其他该国特产物而来。国王由此市之征税而获巨额收入，全国亦受莫大利益。”<sup>②</sup>为了巩固与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阮氏政权的统治者为两国提供一系列贸易优惠政策。阮主聘请华商和日商在政府外贸管理机构中任职，参与交趾支那对外贸易的管理，给予华商与日商在税收、管理等方面一些特权，华商和日商在交趾支那的贸易竞争优势更加凸显。

阮氏政权的对外贸易衍生出了侨民区。为了便利贸易往来，华人、日本人、葡萄牙人开始在会安设立商馆，阮主为了吸引外商，准许华商和日商在会安建立侨民居住区，华商建立了唐人街，日商建立了日本町。波里描述道：“交趾支那王为了上述大定期市之方便计，曾准许华人及日人选择一适当地点以建设市镇。此镇称为会痛；因其地甚为宽阔，几可令人认出两街：一为华人街，另为日人街，各街分置头领，而依据各自习俗生活；华人依照中国固有之法律及风俗，日人则依照其固有者。”<sup>③</sup>由于三国悠久的历史渊源，华商和日商与广顺地区人民之间的交流更加流畅，很多贸易事务融通、商品采买也交由华商或日商代办，他们也逐渐成为推动阮氏政权早期对外贸易崛起的重要力量。

## 二、阮氏政权内外市场联动格局的形成

随着对外贸易的规模扩大，阮氏政权原有的内部经济流通状态被打破，山区和平原的经济资源实现整合，内外市场实现联动发展。

### （一）对外贸易打破了传统的内部市场经济循环

在阮氏政权开展对外贸易之前，广顺地区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在区域内完成循环。由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生产和市场规模较小，为了对抗黎郑集团和保证其军事政体的运转，阮氏政权急于从国外获取先进武器，所以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打破了传统的内部经济循环。

---

<sup>①</sup> 闫彩琴：《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越南华商研究（1640~1802）》，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66页。

<sup>②</sup> Chritoforo Borri, *Xu Dang Trung nam* 1621, Ho Chi Minh:Nha Xuat Ban Thanh Pho Ho Chi Minh, 1998, pp.90.

<sup>③</sup> Ibid., p.92.

阮氏政权通过专买专卖的垄断贸易方式实现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发展。为了最大化获取贸易收入，阮氏政权采取专买专卖的垄断贸易方式，强制民众生产国际市场所需农产品，许多农民在免除人头税与兵役的诱惑下脱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专门从事珍稀物产采集、经济作物种植等生产活动。阮氏政权针对一些出口商品设立了专业生产部门和特殊行政区划，如负责伐木制作船只的舟匠属、提炼和开采食盐的盐户属、在山林溪流中捕猎异兽和鱼类的河伯属、采集燕窝的清洲队、专门开采和提炼黄金的镰户属等。这些农产品和天然物产形成规模化生产，并通过会安进入国际市场，内外市场开始产生联动。

## （二）内部消费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发展

阮氏政权在发展对外出口贸易的同时，进口商品消费市场也逐渐形成。阮氏政权经历了东南亚贸易“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从奢侈品向诸如大米、糖、棉花、木材、各种金属等大宗商品转变的过程”。<sup>①</sup>随着阮氏政权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居民购买能力的增强，阮氏政权进口商品贸易不再是以武器和奢侈品为主导，廉价日用品逐步成为进口的主流。波里曾形容当时交趾支那农村集市的贸易情形：“梳子、针、手镯、玻璃珠耳坠，还有其他小用品和妇女们的物件。我还记得有个葡萄牙人以不到30达科特的价格从澳门买了一整盒针，带到交趾支那出售时，卖到上千达科特，在澳门每根针不值一便士，而卖给交趾支那人时每根针就卖到1里亚尔。”<sup>②</sup>受到妇女追捧的商品卖得很快，因为东南亚本地的乡村贸易基本上全部掌握在妇女手中。<sup>③</sup>早在17世纪，张燮的《东西洋考》里就记录了广顺地区妇女参与贸易的情况：“顺化多女人来市，女人散发而飞，旁带如大士状。入门，以槟榔贻我，通殷勤。”<sup>④</sup>英国人米尔本也对会安市场上精干狡黠的妇女记忆尤深：“越南妇女是会安市场最主要的本地商人，她们不但是持家能手，而且在生意上精明能干，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当地女子常提着一小袋白糖或冰糖作为样品，蹲在街边等待买主问价；或径直登门，主动找一些大买主推销。一旦双方就样品蔗糖的价格达成协议，女子们便会将客户所订购的砂糖扛入买主的货舱。接着，未及买主将货物过秤，她们就以测试砂糖质量为借口，用一把长柄的锥形铁棍不断地插入每个糖袋，让白糖从破裂的袋口泻在地上，借机将

<sup>①</sup> Victor Liberman: Local Intergration and Eurasian Analogies: Structruring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c.1350~c.1830),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7, No.3 (Jul, 1993), pp.490.

<sup>②</sup> Chritoforo Borri, *Xu Dang Trung nam 1621*, Ho Chi Minh: Nha Xuat Ban Thanh Pho Ho Chi Minh, 1998, pp.90.

<sup>③</sup> 安东尼·瑞德著，孙来臣等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二卷），第102页。

<sup>④</sup> 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一），“交趾条”，《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劣质的白糖和优质的白糖混在一起，以次充好，令外国买家眼睁睁地看着广南女子当面变戏法，徒呼奈何。”<sup>①</sup>由此可见，“内区自身由以商品集散地为主变为一个消费市场”。<sup>②</sup>

### （三）对外贸易促进平原市场与山区市场的整合

对外贸易使阮氏政权平原和山区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阮氏政权入驻广顺之初，所辖的西部山区是“世界上最不连贯的疆土”。<sup>③</sup>东西流向的密集河流把由南至北的长山山脉切割得支离破碎，地理上的不连贯性和交通不便导致内部市场形成的过程十分缓慢。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平原村落与高山村落的直接贸易也变得频繁起来，“在17、18世纪阮氏治下的南方，越南人与高原人之间的贸易远比今人想象的重要”。<sup>④</sup>交趾支那高原地区的贸易以甘露镇为核心，上通寮保山口，下通越海口。商人经常“载盐咸、干鱼、铁器、铜锅、银子钗钏诸杂物往蛮人地，易取栗子、鸡、牛、麻蜡、藤褚、蛮布、蛮幔各货。傭象载回甘露，蛮人亦有载货物下甘露贩卖。一象可载米三十拾，每拾二十本，亦有一市番驱牛至三百只来卖，一牛不过十贯，一象价银值二笏”。<sup>⑤</sup>山区的天然物产是阮氏政权重要的经济来源，许多季节性特产如沉香木、蜂蜜、肉桂等都通过会安季风贸易加入流动与交换之中，贸易季一到，当地的商品就通过船、牲畜及搬运工从长山和秋湓河冲积平原涌入会安的市场以待出口。<sup>⑥</sup>对外贸易推动了农村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内外市场产生了积极互动，平原与被山脉、河流分割的山区因为海外贸易强大的推动力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三、阮氏政权内外联动发展格局的形成

对外贸易推动了阮氏政权内外市场联动发展，许多农民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走出来，投入以对外贸易为主导的农业生产中，加速了农业商品流通的货币化和流通货币的资本化进程。至此，外部资本与农业产业实现全产业链融合，阮

---

<sup>①</sup> William Miburn, *Oriental Commerce: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principal Places in the East Indies, China, and Japan, with the Produce Manufactures, and Trade, Including the Coasting or Country Trade from Port to Port.....Deduced from Authentic Documents, and founded upon Practical Experience Obtained in the Course of Seven Voyage to India and China*, First Published in 1813 by Black, Parry, and Company, London, This Edition 1999, New Delhi: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Ltd, Volume2, pp.454~455.

<sup>②</sup> 李塔娜著，李亚舒等译：《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101页。

<sup>③</sup> 同上，第105页。

<sup>④</sup> 同上，第157页。

<sup>⑤</sup> 黎贵惇：《抚边杂录》（卷四），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b~5a页。

<sup>⑥</sup> 闫彩琴：《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越南华商研究（1640~1802）》，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22页。



阮氏政权内外联动发展格局全面形成。

(一) 对外贸易推动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

对外贸易刺激了生丝的专业化生产。种桑养蚕在广顺地区相当普及，波武尔在其日记中写道：“交趾支那丝绸比中国丝绸品质更好，织工更精细。最好的丝产自广义省。中国人买走甚多，获利达到10%~15%。”<sup>①</sup>广顺地区的丝绸最受日本人欢迎和追捧，居住在会安的日本人常常去产丝区（主要是广南的升华县和莫磐县）提前买光整季的蚕丝收成，所以内区的蚕丝供不应求。<sup>②</sup>据荷兰商人巴克回忆：“当它的两艘船于1633年来到交趾支那时，丝价高到每担180~200两白银，原因是两艘日本船只刚买走了价值40万两白银的货。”<sup>③</sup>居住在会安的日本人将生丝贸易网络和触角深入乡村各户。当地养蚕是一年两季，日本客商亲自或派伙计到交趾支那的农村各地，事先预约桑苗和蚕茧，预付给各农家铜钱一百文到二百文，并约定不得将生丝卖给其他国家的人。预付款制度降低了生丝交易的风险，同时巨大的利润也让农民从传统的稻米种植转向养蚕业，<sup>④</sup>生丝的商品化使其在阮氏政权对外贸易初期扮演了关键角色，随着会安转口贸易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商被广顺地区的生丝所吸引，为阮氏政权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糖品贸易带动了糖料作物生产的快速发展。16世纪中国的提炼方法传入交趾支那之后，蔗糖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糖品成为阮氏政权出口中国、日本的大宗产品。在20年内，交趾支那的红糖出口量增加了将近3倍。到18世纪60年代，交趾支那的食糖出口量已达3000~3500吨/年，其中，1650~1745年，交趾支那出口到长崎的糖增长了40倍。进入18世纪，白糖则取代了红糖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冰糖的售价比白糖大约高出20%，是红糖价格的将近3倍。<sup>⑤</sup>制糖业主要集中于冰糖生产，其生产规模大约可与东南亚糖料中心爪哇18世纪初的糖业生产规模相媲美。由于出口以冰糖为主，1767年交趾支那糖产值又出现了飞跃式增长。18世纪

<sup>①</sup> “Description of Cochinchina, 1749~1750”, From “Voyage de Pierre Poivre en Cochinchine. Description de la Cochinchine(1749~1750). Voyage du vaisseau de la Compagnie le ‘Machault’, a la Cochinchine en 1749 et 1750”, in *Revue de l'Extreme-Orient*, Vol.3, No1, (1885), pp.81~121. Translated by Kristine Alilunas-Rogers, in Li Tana, Anthony Reid (ed.), *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Nguyen*, pp.86.

<sup>②</sup> 李塔娜著，李亚舒等译：《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81页。

<sup>③</sup> Wilhelm Jozef Maria Buch,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en Quinam: de betrekkingen der Nederlanders met Annam in de XVIIe eeuw*. Amsterdam, H.J. Paris, 1929, pp.24.

<sup>④</sup> 尤建设：《试论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与越南的朱印船贸易》，《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70页。

<sup>⑤</sup> 李塔娜：《十八世纪的交趾支那：经济作物、华人和西山》，《学海扬帆——甲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28~929页。

糖产量的增加是交趾支那经济增长的重要标志之一。<sup>①</sup>海外庞大的进口需求让阮氏政权有了强迫农民扩大甘蔗种植与糖品生产的动力。

胡椒也是阮氏政权出口的重要经济作物。每年五月上旬，阮氏统治者都会“差新一船队长与精兵出就地方，合民随园多少分包，会数定价。买取椒子一担发钱五贯，载回清河庸卖于艚客，不许方民私卖”。<sup>②</sup>产量的提高得益于当地华人对胡椒种植技术的改良，当地种植胡椒的华工把胡椒藤上的叶子去掉，这样有利于保持养分，吸收阳光，同时采用合理密植的方法，让胡椒的产量增加了1倍。阮氏政权通过垄断销售胡椒，获利3倍以上，而商人把胡椒运到中国可获利1倍左右，比起自给自足固定的农耕收入，胡椒对于农民来说有着更为可观的利润。

## （二）对外贸易加速农村商品流通的货币化进程

内外市场联动格局的逐渐形成也使农村商品的流通纳入国际货币支付体系。阮氏政权在发展对外贸易初期就面临流通货币严重不足的困难，广顺地区虽然出产黄金，但是缺乏国际贸易大宗商品流通支付所需的货币如铜币、银两等，又不具备铸币能力，只有通过日本的朱印船贸易缓解流通货币供应量不足的问题。17世纪初期，日本幕府实施统一货币政策，致使一部分曾通用于日本市场的中国铸币在日本市场上无法流通，于是日商、华商、荷商、葡商就把那些日本的“废币”贩卖到交趾支那牟利，由于该项贸易有着巨大的利润，大量“废币”流进交趾支那。李塔娜认为，这些铸币的流通首先是满足了17世纪内区的贸易需求，其次又刺激了这一需求。进口铸币弥补了流通货币的不足，所以虽然国家不造币，但并不阻碍17世纪早期交趾支那的迅速发展。<sup>③</sup>

对外贸易打破了内部市场的封闭状态后，许多国际货币随着内外市场的联动涌入农村市场，农村商品货币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市场上的商品不再只有本国的农产品或者是天然物产，世界各地的商品都出现在农村的集市中，比如广州陈姓商人就曾介绍当时各国百货在广顺地区内部市场交易的情况：“转贩流通，脱货快利，无有滞积不售。所带来五色纱缎、锦缎、布匹、百味药材、金银纸钱。彼此有无，互相贸易，无不得其所欲也。”<sup>④</sup>随着农村商品货币化程度的加深，农民的生产 and 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农民缴纳的贡赋逐渐由实物变为货币，

<sup>①</sup> 李塔娜：《十八世纪的交趾支那：经济作物、华人和西山》，《学海扬帆——甲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第928-929页。

<sup>②</sup> 黎贵悖：《抚边杂录》（卷六），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0b-211a页。

<sup>③</sup> 李塔娜著，李亚舒等译：《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110页。

<sup>④</sup> 黎贵悖：《抚边杂录》（卷四），第35b页。

“守门例钱，大社一百人以上，钱三陌；中社七十人以下，钱一陌三十文；小社三十人以下，钱一陌”。<sup>①</sup>可以说，货币化提高了政府征税的效率，充足的税收有效地保障了军事政权的运转。

### （三）季风贸易催生的流通货币资本化

17世纪东南亚贸易的商船主要靠风力驱动，季风和洋流对贸易船的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位于广顺地区的重要商业中心会安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发挥海港与河港的双重作用，利用季风开展贸易活动。广顺地区最主要的外销农产品生丝、胡椒和糖的出产季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2~8月，生丝的出产和胡椒的收获期在5~6月，糖的原料甘蔗的收成期则在每年年末，糖的加工高峰期在每年的年初。以日本在广顺地区的生丝贸易为例，当地丝商根据日本人到来的时间将所产的丝分为两类：新丝和旧丝，新丝即每年4月到6月收获的丝，旧丝即10月到2月期间所收获的丝，旧丝每担（约60公斤）只卖到100至110两白银，而新丝则卖到140~160两白银。<sup>②</sup>生丝、胡椒和糖出产的时间正好在季风的转换期间，因此在会安形成以季风为导向、为期达7个月的贸易市场，与农产品生产周期紧密结合在一起。

季风性贸易模式催生了预付款贸易制度，商业资本渗透进生产领域。由于生丝、糖等农产品具有生产周期，只能在特定的季节进行贸易，为了保证采购商品的稳定供给，外商为出口商品预付定金，而商品流通货币化也便于预付款和订单生产，因对外贸易而生的预付款制度让流通中的货币进入生产领域，保障了农村商品化生产运转过程所需的大量资本。比如17世纪40年代后因日本锁国政策而滞留在广顺地区的日商，为了谋求生路，在交趾支那充当起中间商的角色，“日商往往通过提前向当地糖、丝以及其他产品的生产者支付订金、预定产品的方式，替外国商船采购商货，以保证其抵越后有充足的货源”。<sup>③</sup>预付款模式促进了商业资本进入生产领域，提高了农村的生产组织效率和商品化程度，刺激了经济作物的规模化生产。

### （四）金融资本的渗透完成联动发展格局的建构

17世纪末中国成为东亚贸易中心之后，东南亚的商品进出口贸易的支付都与中国的铜币挂钩。随着对外贸易顺差的扩大，国际上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致使中国银价下跌，但大量铜币流向东南亚，影响了整个东南亚贸易的平衡，尤其以交趾支那为首的东南亚港口国家，对铜钱的需求更迫切。许多商人看到了从交趾支

<sup>①</sup> 张登桂等：《大南寔录前编》（卷八），第3b页。

<sup>②</sup> 李塔娜著，李亚舒等译：《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67页。

<sup>③</sup> 潘嘉忭著，何廷庆译：《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1页。

那运输商品到广州转售给欧洲商人，同时把铜币卖到交趾支那获取暴利的巨大商机，所以前往交趾支那贸易的华商急剧增加，中国的金融资本源源不断流入交趾支那。在行商制度兴起的条件下，依靠对外贸易发展起来的预付款和订货制度保证了广州的金融资本畅通流向交趾支那，也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作物的规模化种植和市场供应提供了稳定保障。

在对外贸易的推动下，农村商品流通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货币流通进入生产领域，最终将阮氏政权纳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阮氏政权联动发展的格局全面建构完成。

#### 四、对外贸易与农村经济联动发展对阮氏政权社会生活的影响

阮氏政权为了更全面地发展对外贸易，允许外国商人在会安等商业中心建立商馆和侨民区，随着华人大量移民并参与南部大开发，交趾支那的婚姻关系、职业阶层、村社结构、组织治理等都发生了新变化。

##### （一）阮氏政权对外贸易衍生出的跨国婚姻制度

对外贸易推动了华侨“两头婚”制度的形成。16世纪下半叶，为了更好地在当地开展贸易活动，阮氏政权统治者鼓励一些华商在会安逐步建立起商业街区并定居下来，华商为了能顺利进入当地市场则会选择当地女性组成跨国家庭，通过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方式来延伸自己的贸易网络。大汕曾在《海外纪事》中谈到，“凡客此者，必娶一妇，以便交易”。<sup>①</sup>英国学者布赛尔认为：“未婚的中国男性移民进入印度支那后，通常是娶当地妇女为妻。他们这样做，不仅是由于取得配偶的天然需求，而且由于这种婚媾有利于他们同该国人民经商。”<sup>②</sup>这是典型的“两头家”婚姻，即华侨在家乡娶妻，在海外经商或务工时另娶当地女子为妻，结发妻子掌管国内家庭，而越南妻子则掌管海外家庭，协助其发展事业。

“大部分人在贸易季来到当地，停留数月之后返回中国，因而不少华商在侨居社区与家乡有着‘两头家’。他们每年的贸易季与越南妻子之间维持婚姻关系，当年贸易活动结束后，华商就返回原籍地的家，待下年贸易季来临时再重返越南。”<sup>③</sup>

商业活动提升了越南本土女性的家庭地位。“17~18世纪已迈入繁荣发展时期，许多女性也参与到贸易之中，女性涉及金融运作、银钱放贷生息的情况屡见

<sup>①</sup> 大汕撰，余思黎校：《海外纪事》（卷四），第80页。

<sup>②</sup> 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第4页。

<sup>③</sup> 闫彩琴：《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越南华商研究（1640~1802）》，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214页。

于契约银钱胎借、典当契约中，她们可能代替丈夫出面放贷收租作息，成为女性债权人。”<sup>①</sup>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家庭以父权为主导，妇女对财产的处置权有相当大的限制，但越南的情况总体上显示了女性在社会事务和财产分配上的独立地位和活跃程度，与传统家庭中的妇女有较大差别。究其原因，对外贸易形成的商品经济环境和“两头家”婚姻起到了主要作用，这些妇女在财产的继承和分配上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和自主权。<sup>②</sup>

妇女成为华商在交趾支那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安华商在除了依靠血缘建立起来的“兄弟贸易网络”之外，通过与土著妇女的婚姻形成的合作网络关系也是华商贸易网络的重要补充。当地女性更容易成为贸易活动的主导。17世纪初，荷兰商人沃登拉尔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在会安与顺化的一位女商人交易胡椒的过程：从验收样品、讨价还价再到达成协议，整个交易全程都是女商人在负责谈价。<sup>③</sup>可以说，跨国婚姻对交趾支那内部市场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跨国婚姻中，华人在家内权力已不同于原乡的家庭结构，在以商业利益为主的婚姻中，性别限制也极易被跨越。<sup>④</sup>在谈到当地通婚的华商群体时，魏长乐认为：与越南人通婚后，在血脉上和阮氏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以及当地社会均相连相通，这种介于本地社会与外商社会之间的族群身份，再加上入籍后效忠对象的转向，使其成为阮氏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最佳平衡点。<sup>⑤</sup>

## （二）对外贸易推动了新兴职业的出现

对外贸易带动了服务业的繁荣。17~19世纪，华商与阮氏政权贸易往来频繁，一些华人在各大商贸中心为前来经商或者寓居本地的华人和内陆本地人提供商业或生活服务。以会安商港为例，华人所开设的客栈、酒楼、中药铺、裁缝店、茶馆比比皆是。除上述服务行业外，会安明香“还有一种服务方式是（给袋子、篮售）进行打包、包装，不仅是为了保管、运输他们自己的货品，而且还为其他外商提供此项服务。他们在夹制肉桂、槟榔干的风干与储藏、鱼翅、燕

---

① 张侃、壬氏青李：《17~19世纪会安华人家庭与妇女》，《全球史评论》，2015年第七辑，第136页。

② 同上，第137页。

③ 闫彩琴：《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越南华商研究（1640~1802）》，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212页。

④ 张侃、壬氏青李：《17~19世纪会安华人家庭与妇女》，《全球史评论》，2015年第七辑，第142页。

⑤ 闫彩琴：《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越南华商研究（1640~1802）》，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237页。

窝等的加工、储藏方面十分有经验”。<sup>①</sup>可见，除了餐饮、制药、制衣等常见的服务行业外，会安还出现了从事包装、食品保管、加工、储藏等较为新兴的服务行业。另外，房屋租赁也是许多华人从事的一种服务业。陈荆和先生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会安唐人街及其商业》中曾谈到外商罗伯特·克索普对房屋租赁业的描述：“会安市镇无异是一条狭长的街路；其靠近河岸之一边便是一排几无立锥之地的房屋，在交易期间，每间可攫取两百至五百贯之租金；此外尚有较小、但充分可适之房屋，每月以八至十二贯则可租到。”<sup>②</sup>包括明香在内的南方华人所从事的上述种种服务业，不仅为华人及当地百姓的生活提供了便利，还对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 （三）华人移民对南部大开发的影响

华人移民潮对阮氏政权的南进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交替之际，许多南明的旧臣和遗民不愿意接受清朝政权的统治，纷纷逃往南洋，“自明季寇乱中华，士民流寓彼境者以亿万计”。<sup>③</sup>这一记载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依旧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期东南亚出现了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潮。由于华人多年的经营，广顺地区也自然成为华人南迁过程中比较集中的居留地和避难所。郑怀德曾经记录自己的祖上因为“大清入中国，不堪变服剃发之令，留发南投，客寓边和”。<sup>④</sup>《海外纪事》中形容来到广南避难的明朝移民“方言中华，皆称大明，唯知先朝，犹桃源父老止知有秦也”。<sup>⑤</sup>杨彦迪、黄进、陈上川等人的南投则把华人移民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1679年，“故明朝旧将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率兵三千余人、战船五十余艘，投思容、沱囊海口，自陈以明国辅臣，义不事清。故来愿为臣仆”。<sup>⑥</sup>阮主借用杨彦迪、陈上川武装集团“因彼之力，委之辟地以居，斯一举而三得矣”。<sup>⑦</sup>首先，阮主招降大明旧臣、笼络人心，是对华人优待政策的一次延续。其次，让这支武装力量远调边廷可以减少对中央威胁，也能培植自己入侵真腊的势力，使其成为南拓的

① 陈文安、阮志忠、陈映：《17~19世纪明香社与会安商港》，广南遗迹遗产保护中心2005年版，第64页。

② 陈荆和：《十七、十八世纪之会安唐人街及其商业》，《新亚学报》，1957年第3卷第1期，第286~287页。

③ 余缙：《大官堂文集》（卷二），“属国效顺疏”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67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26页。

④ 郑怀德著，陈荆和编校：《良良诗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1962年版，第126页。

⑤ 大汕著，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卷二），第14~15页。

⑥ 张登桂等，《大南寔录前编》（卷五），第22a页。

⑦ 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三），“疆域志”条，戴可来、杨保筠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先锋。最后，可以利用华人的劳动力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对东浦进行开发，创造巨大的财富。于是阮主“爱命犒劳嘉奖，仍准依原带职衔，封授官爵令往农耐以居，拓土效力”。<sup>①</sup>由此成为华人开发南圻的发端，同时也标志着华人迁移的趋势由分散化、阶层多元化向集团化、专业化、政治化的转变，为后来华人村社在越南南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华人垦殖与开发推动了越南南部经济中心的形成。杨彦迪、陈上川到达东浦之时，这些地方都是蛮荒之地，“沿边江河，灌莽丛杂，内皆土阜”。<sup>②</sup>华人到来之后，展开了全面的大开发。在农业上，“西岸守所，华民、唐人、高蛮店社稠密，栽植芬烟、瓜果，晒干做虾”。<sup>③</sup>在河仙镇，“西北多林阜，东南多田泽，华人、唐人、高棉人杂居耕，亦称膏腴之地”。<sup>④</sup>经过数十年的辛勤耕耘，以华人为主体的移民终于把荒蛮的南方开发为一个“园裕椰芙、瓜果、桑麻，沟渠溢鱼虾、龟鱉，家自为食，不必购求于市。前园后田，各有恒业，民称富庶焉”<sup>⑤</sup>的富饶之地。在商业上，华商成为阮氏政权推动南部商业城市形成的主导力量，“城前津铺市房舍稠密，沿江而市。津头例于春首祓祭日，演阅水兵。津有横渡，接济洋客登岸。北头沙鱼沟，横架板桥，两掖瓦铺，百货凑集，沿江商船，大小络绎”。<sup>⑥</sup>18世纪中叶，在华人和各族人民的大力开发下，柴棍（西贡）、嘉定等地已经成为富庶的农耕区、人烟稠密的乡村市镇和外商云集的贸易港口。各国商人在越南活动的重心，也逐渐从中圻的会安等港转移到南圻沿海的西贡、河仙等海港。<sup>⑦</sup>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布赛尔所言：“在暹罗湾和南中国海之间的南圻地区在国际航线上拥有有利的地理位置，有利于接纳华人的到来。本区的经济情况——拥有肥沃的稻米产区，便利的水网交通，发达的国际贸易——对于大部分经商的华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sup>⑧</sup>在手工业上，华人为阮氏政权带去陶器制造、蚕丝业印刷、冶金、编织、木器、雕刻、制糖等技术，促进了阮氏政权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其丝织品媲美中国丝织品。物美价廉，深受日本和欧洲市场欢迎。

① 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三），“疆域志”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122页。

② 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二），“山川志”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102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106页。

⑤ 同上，第92页。

⑥ 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六），“城池志”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209页。

⑦ 闫彩琴：《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越南华商研究（1640~1802）》，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208页。

⑧ 同上。

#### （四）华人融入南部大开发对越南村社结构的影响

华人移民的快速增长也催生了大量的华人村社。华人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开发创造了可观的财富，此时来到南圻的华人不仅仅是在此居留的商人，还有大量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参加各种抗清组织的群体。阮氏政权为了实现对南圻的有效控制，命“统帅掌奇礼成侯阮有镜经略高蛮，以农耐地置为嘉定府，立全瓯处为福隆县，柴棍处为新平县，建藩镇营。营留该守、该簿、记录以守牧之。衙属有舍吏二司以干办之”。<sup>①</sup>随后又“斥地千里，获民逾四万户，招募布政州以内流民以实之。设置社村坊邑，分割地分，征占田土，准定租庸，缮修丁田簿籍。于是唐人子孙居镇边者，立为清河社，居藩镇者，立为明香社，并立边户”。<sup>②</sup>阮有镜入主嘉定成为华人移民村社发展的开端。郑怀德在这里所说的“明香社”，在阮氏政权时期被称为“明香社”，原为延续明朝国祚香火之义。明香社的成立是越南农村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它标志着华人在越南已经由最初的商品贸易、侨民定居逐渐发展到建立基层村社，这是对外贸易发展延伸的结果，也是华人深度融入越南社会经济的重要表现，至此，华人与当地原住民已形成休戚相关的群体。

华人村社在阮氏政权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明香社形成过程中，不同阶层的华人持续加入，所以不免会出现社外华商与明香社华商成分交织的现象。魏长乐认为，阮主之所以会在会安创立明香社，主要是基于最大限度维护其商业利益的考量，意在从外来人口中选择一个特殊群体来管理当地贸易并监管外商社会。<sup>③</sup>首先，明香人参与对外贸易的管理，比如“检查船只称斤价值、在华船或其他外国商船来会安时担任通事，并设定价格等”。<sup>④</sup>这为前来贸易的华商提供了便利，外来的华商与当地侨居的华人通过“华人兄弟网络”逐渐连为一体，互惠互利。其次，明香人与社外华商联系紧密，由于明香人依靠阮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占有土地，不纳税赋，所以社外华商可以通过商业网络向华人村社输出资本，许多明香人通过商业资本实现对土地的兼并，用于开发经济作物种植园，发展粮食贸易以及修建维系血缘、乡缘的庙宇。最后，明香人在内外市场联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所有穷困偏远乡村、商业中心和大小海港，都有华商

① 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三），“疆域志”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123页。

② 同上。

③ Charles J. Weeler, “Cross-cultural Trade and Trans-regional Networks in the Port of Hoi An: Maritime Vietna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1, pp.167~169.

④ 陈荆和：《关于“明香”的几个问题》，《明代国际关系》，学生书局1968年版，第153页。



的身影。”<sup>①</sup>许多华人，“或以船为家，或籍以趁市探亲，运柴米，行商贾，尤为利用”。<sup>②</sup>当地农村市场在明香人的带动下，内外市场出现了积极互动，“以四更初，山野之人明烛拾负瓜果蔬菜，聚市西头团坐，贾人窝卖而归。质明，市东头大街南北，鱼肉货物始列肆焉，黄昏方散”。<sup>③</sup>法商波武尔评价道：“尽管当地人对其怀有嫌恶之意，并在交易时挑起种种麻烦，华人的数量仍在与日俱增。至今在王国内地，甚至在柬埔寨、占城及老挝，处处可见许多华人的身影。他们以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与生俱来的经商天分，并利用原始单纯的当地人对于自享其利的无知，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交趾支那国内商业最重要的部分。”<sup>④</sup>

总之，华人通过参与阮氏政权的南部大开发，全面融入了阮氏政权经济和全产业链之中，正如《嘉定通城志》中所述，湄公河三角洲的华人“辟地开荒，构立铺市，商卖交通，唐人、西洋、日本、阁婆商舶凑集，中国华风已渐渍，蔚然畅于东浦矣”。<sup>⑤</sup>

## 五、结语

本文从对外贸易与农村发展联动机制的视角切入，旨在通过对阮氏政权经济双循环局面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回顾，揭示阮氏政权“百年繁荣”的内在机理。就研究本身而言，虽然尚有很多空白点需要深入研究，但还是能够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阮氏政权的“百年繁荣”是通过构建对外贸易与农村发展联动机制并融入国际经济循环而实现的。第二，在开放型治理体系下，随着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国内外资本、人才、技术、管理等要素互动日益密切，外来群体与本土人群文化融合也会不断加深，由此形成一个休戚相关的群体。第三，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剖析，本文为当代开放型经济体构建双循环发展模式找到一个历史样本，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提供一个鲜活的历史案例。

[责任编辑：郑佳]

---

① 张国学等：《16~18世纪安华人群体的形成及华商的贸易活动》，《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3期，第41页。

② 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四），“风俗志”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179页。

③ 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六），“城池志”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209页。

④ 闫彩琴：《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越南华商研究（1640~1802）》，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57页。

⑤ 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三），“疆域志”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122页。